

移动互联网语境下青年群体工作实践的媒介化转向

赵红勋^{1,2}, 王文静³

-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 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 河南开封 475001;
- 福州理工学院文理学院, 福建福州 350506)

摘要: 在充斥着“劳动”意指的当代“工作实践”中, 青年的主体价值得以彰显。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强力渗透, 青年工作实践的主体、场景以及关系等多重维度日渐呈现出“媒介化”转向。从实践主体向度来看, 青年与媒介的融合互嵌重塑了工作的主体角色, 并借由行动逻辑铺展了新的媒介化惯习; 在实践场景方面, 新媒体在常态化的运行中融入青年工作的诸多环节, 并通过即时性场景搭建将工作内容延伸至生活空间; 从实践关系维度来看, 媒介化交往正在改写青年工作关系的网络谱系, 严肃性的层级结构被瓦解, 媒介化的联结关系走向了交际的中心。当然, 青年工作实践的媒介化转向之中浸润着资本的运行逻辑。媒介在弱化青年工作制度的同时, 也建构了更为隐蔽的权力关系模式, 不仅扩大了青年的资源差距, 而且重新分配了青年的自我时间。

关键词: 青年群体; 工作实践; 媒介化; 劳动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4) 01-0049-11

一、问题的提出

在日常实践的话语图式中, “劳动”占据了人类生存图景的显要版面, 并在生产变革以及文明进阶的社会征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正如曼纽尔·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所言, “劳动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核心”^[1]。作为形塑社会结构的核心力量, 劳动的意指实践在技术形态再造下正在发生嬗变, 体力劳动的话语结构日渐式微, 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工作”概念正以一种普泛化的态势在社会生产的诸多领域被普遍应用, 并日益成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地使物质世界产生变化的活动”^[2], 从而在“行动”的意义中促使人类的经验形式与自然社会完美衔接, 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在“工作”的行动话语中, 无论是生产领域, 还是服务行业, 抑或科研范畴, 青年群体都始终以一种核心性、中间性的力量发挥作用。尤其是在体力劳动的概念渐次被消解的现代社会, 工作实践在技术更迭、社会需求与资本经营等多重作用下出现了脑力劳动、数字劳动、情感劳动等各种劳动方式与类型。黄庆平、张振华等人对数字经济时代的职业演进与青年职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萌发了新业态与新模式, 创造了很多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新职业, 青年群体大量涌入其中, 使新职业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3], 青年人凭借其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强大的融合力成为新型劳动方式的实践主体。

置身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所裹挟的当代社会, 手机、iPad 等各种终端设备日渐植入工作场所的空间结构, 使劳动的工作形式和内容呈现了移动化、跨媒介性的特征, 电脑办公、微信沟通、线上会议等以

媒介技术为依托的工作形式更加贴合当下青年的实践诉求。根据 Quest Mobile 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1 月移动互联网行业月活跃用户活动中办公商务为 6.15 亿人,同比增长率为 4.3%,办公商务的腾讯文档月活跃用户规模为 1.46 亿人,其中,Z 世代在办公商务方面的渗透率为 62.5%”^[4]。由此可见,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高度卷入,青年作为新工作模式下的关键力量正凭借自身的媒介学习力与适应性建构着“媒介化”工作的新实践样态。然而,目前有关青年群体工作实践的研究,主要围绕“职业认同”^[5]“幸福指数”^[6]“生活境况”^[7]“数字劳动”^[8]等内容而展开,虽有研究涉及媒介化意义的数字劳动实践,但是研究内容更多的是在具体的个案中解读青年工作的某一问题,缺乏对青年群体的工作行为/场景如何媒介化的深入探究。基于此,本文立足移动互联的当代语境,在媒介化理论的观照下,尝试从主体、场景及关系等维度考察青年工作媒介化的实践面向,并揭示其背后蕴含的技术和权力话语,为深入理解青年的劳动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参照向度。

二、媒介化:诠释青年群体工作实践变革的新思路

在传播研究的传统认知结构中,“媒介”“文本”与“受众”等三种元素建构了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其内在的相互连接关系亦成为学术研讨的思考路径。经此路径所投射的“媒介”意涵,关联着一种“中介化”思想,成为个人和组织为实现不同用途和目的的手段。^[9]在作为工具化的中介意义中,媒介技术的物质性议题将内容承载进行抽离^[10],认为媒介是改变和影响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尤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为代表的媒介生态学派最为明显。其从宏观层面强调媒介对社会的单向塑造,折射的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话语论调,忽略了媒介在“内爆”过程中如何嵌入日常生活结构,并在社会机制和文化进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9](4)}由此,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尼克·库尔德利(Nike Couldry)、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等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媒介的研究转向,以“媒介如何影响更为广泛的文化和社会”为逻辑起点,借由社会学的理论知识,从多种层面反思媒介与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建构了“媒介化”的理论谱系。

在关涉媒介化的诠释视角中,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ist)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constructivist)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方面,媒介以制度化形式参与社会运行的过程。发轫于“政治媒介化”的制度分析,将媒介化理解为“媒介对于政治过程、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行动者的影响日益加强的一种过程”^[11]。之后,媒介化不再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不断延伸至日常生活的诸多范畴,包括新闻生产、游戏娱乐、宗教信仰等。在媒介化的制度建构中,媒介不仅是一种半独立的社会机构,而且其本身也成为其他社会制度的构成部分,并在新技术话语的强力烛照下,日益演化为被其他制度越来越依赖的“共有之物”^{[9](24)}。由此,媒介以一种动态的制度形式参与社会结构的运转。另一方面,媒介对社会具有建构作用。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阐释中,社会现实是通过社会行动而得以确立的。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看来,“所有可以改变事物存在状态的东西都是行动者”^[12]。由此,行动主体不仅指向的是人,而且还包括物。正是在这种行动的意义中,库尔德利重构了对媒介的实践认知。在他看来,媒介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物件、文本或感知工具^[13],而是一种扩展人们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因素,它可以带来一种新的交流情景(context)^[14],这种交流情景使社会公众可以共同参与社会事务。正是在这种行动化的参与实践中,媒介在“中观层面”的社会型构力才得以更大程度的彰显,并借由自身的媒介逻辑参与社会文化的形塑。可以说,媒介化在打破传统的“效果研究范式”和“新受众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将媒介纳入文化与社会领域进行考量,重构了媒介、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媒介的实践路径铺陈了媒介化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得以深化与延宕的新型空间结构。

依循媒介化的研究理路, 移动互联技术赋能下青年群体工作实践的表征结构正在经历媒介化转向。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中, 媒介开始浸入青年群体的劳动化工作空间, 并改变了既有的工作秩序和规则, 形塑出新的工作场景。新技术下的新职业打破了传统经济下原有职业的时空边界和雇佣关系, 使青年从业者的工作场所、内容和方式变得更具多元性与灵活性。^[3] 在新型化的场域中, 媒介成为影响乃至控制工作形态与实践内容的关键要素, 亦即工作实践逐渐因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而发生变革。

一方面, 移动互联技术以媒介化方式渗透青年的劳动性工作过程。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 使用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的时长远远高于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15], 新媒体成为当下青年不可或缺的实践媒介。在青年的工作实践中, 移动终端将工作的主体、内容、场景、关系、空间等一系列要素拉入一个共同的实践渠道之中。一部手机、一个薄薄的 iPad 或笔记本电脑所承载的信息即可满足部分工作需求, 微信沟通、电子办公、网络会议、线上协作、数字化存储等工作方式在媒介技术对工作场的融合中走向自然化和常规化。可以说, 无论是业务沟通, 还是文稿撰写, 抑或会议举行, 手机等各类移动终端凭借其技术的“可供性”赋予这些工作过程以新的互动意义。因为工作的本质意义以个体实现社会化为显著特征, 所以具有移动互联韵味的技术形式在青年群体工作场景的全方位渗透, 建构了“媒介化”的互动场域, 从而在改变现有工作空间结构的基础上, 拓展了青年、工作和媒介之间的深层序列关系。

另一方面, 青年群体工作的行动意义贯通媒介实践的意涵。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来看,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都要通过社会实践来完成, 所以实践被视为一种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对于青年群体而言, 其劳动性工作的实践本身是一种行动力量, 藉由这种具身性实践来进行社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实现自我价值。在这个行动实践的过程中, 其通过手机、iPad 等各种媒介化形式参与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产。在这个工作实践的媒介意义中, 青年与媒介不再是“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 而是以彼此映射、相互融通的状态存在, 并在行动的联结中推动劳动性工作的社会化进程。

可见, 具有媒介化意义的行动实践对青年群体的工作场域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延展与深入, 从而使原有的工作场景、工作关系和制度结构得以消解, 并借由媒介逻辑方式建构了青年工作的实践形态。在媒介实践不断深入的当代社会, 媒介化的学术理路成为我们解读青年工作实践变革的新思路。

三、实践主体: 青年行动与媒介逻辑的融合互嵌

库尔德利曾指出: “移动互联技术来临以后, 任何人在物质空间里都可以进入互联网空间的任何一点了……互联网创造了一个有效而无限的人类行为储藏所, 这个储藏所改变了社会组织在其他空间里存在的可能性。”^{[13](2)} 也就是说, 移动互联技术正在改变社会的空间组织结构, 并促使社会成员融入互联网的“速率”空间之中。根据 CNNIC 报告显示, “截至 2022 年 12 月, 我国网民规模为 10.67 亿人, 其中 20—29 岁、30—39 岁的网民占比分别为 14.2% 与 19.6%”^[16]。庞大的数字奇观涵涉的是青年社会实践的网络化特征。这种网络化实践方式已然渗透于青年的工作场景之中, 并在效能提升的意义驱动中建构着主体的融合想象。作为工作主体的青年与互联网媒介物的具身实践实现了人与媒介的渠道融合, 并借由工作惯习使媒介化的实践表征得以呈现。

(一) 媒介的嵌入: 青年工作主体的重构

在传统的劳动实践中, 作为行动者的“人”似乎一直处于主体性地位。然而, 技术物的行动意义却被忽略。在拉图尔看来, 行动者不仅关联着人的意义, 而且涉及观念、技术、人造物、生物等“非人行动者”。尤其是移动互联技术凭借其超强的穿透能力, 加剧了青年行动者与媒介行动者的融合勾

连,以此重塑了青年群体在劳动工作过程中的主体性书写,即媒介的工具性与青年的主体性紧密融合,共同构成了工作实践的主体。

一方面,新技术“介入”工作场域,重塑了“青年与媒介”的主体形象。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群体的工作实践正在挣脱“体力劳动”表征的束缚,借助移动通信、互联网、物联网等各种技术形式,勾勒新的工作运转地图。移动终端已成为青年群体的身份标配,他们将媒介内容当作日常生活的“参考答案”,依赖从媒介中寻找问题的合理解释与解决途径。^[17]在工作中通过移动电话进行业务洽谈、借由微信群发布工作通知等已成为青年工作实践的一种新常态。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技术正在日渐摆脱作为“工具性使用”的意义,而是通过行动的方式与青年主体实现了一种网络关系的动态关联。因为“非行动者”自身参与社会实践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工具作用,“而是在社会场域中建构新的社会联结(social links)”^[18]。由此,媒介在建构工作场景中的行动者形象的同时,与青年这一人类行动者产生了主体性融合。当青年与媒介进行“主体融合”之时,多元协作的互动关系以一种潜隐方式提升了工作效能,并在这种高效性的诱导下促使青年积极参与媒介化的工作实践。

另一方面,行动主体在工作实践中进行策略性“转译”。行动者在建构网络连接的过程中,其策略构建的路径主要通过“转译”(translation)得以实现。转译是通过不断地转换他人兴趣,从而使多方行动者达成利益的一致性。在工作实践中,作为行动者的青年与媒介之间进行了相互转译,青年的工作思维与媒介的实践逻辑构成了一种意义的交汇,从而产生新的工作理念/方式,即作为工作主体的青年在逐渐具有媒介化思维的同时,也相应地成为媒介实践的“代言人”。不仅媒介成为青年身体的一部分,同时青年身体也成了数字空间中的一种新媒介形式。^[19]在当代青年的工作实践中,腾讯会议等各种视频媒介形式已经广泛渗透,由此青年的身体实践会在视频媒介的不断操演中被强化,希望借助视频的“全景敞视”来实现对工作的跟踪和管理。与此同时,青年也以一种具身参与的形式建构着视频媒介的表征过程。因为青年自身对新媒介技术的敏锐感知及娴熟操作,使其与媒介意义的关联属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一致性,并在常态化实践中诠释其新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媒介行动者的转译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青年在劳动性实践中的主体价值。因为移动互联时代的工作场景已深深地被媒介逻辑所主导,并在行动的实践中巩固和继续了既有的媒介观念和媒介秩序,从而将青年劳动工作的日常惯习演化成为一种媒介化的表征。

(二) 主体的行动:工作惯习的媒介化表征

在日常生活所建构的场域中,惯习作为一种性情倾向系统,它既是个人心智结构的内在表现,又是群体塑造社会文化的实践状态。惯习之所以形成的一个很大原因源于其内在在相对稳定和持久的禀赋结构。只有在这种相对稳定的意义中,对惯习意义的考察才能参悟日常生活的本真原理。在移动互联技术的影响下,青年群体的工作惯习被媒介逻辑所牵制,并在日常生活和技术领域的时空联系中绘制出工作主体的社会构成。

一方面,媒介逻辑浸入青年群体的工作惯习,塑造出全新的工作场景。惯习作为持久的可转化性系统结构,为媒介在青年工作场所的作用力提供路径参考,使媒介逻辑更加贴合青年工作的实践惯习。媒介在一定意义上是融合实践惯习的契机。无论是网络办公中的沟通交流、资料撰写,还是签到打卡、视频会议等媒介实践,其已不再遵循青年工作的线性安排,而是与青年的惯习复合体进行了不断地整合。在整合的意义中,媒介建构了新的工作规则与秩序,青年的工作惯习会依据媒介特性进行调整,并按照既定的媒介规则行事。工作中随处可见的电子设备和无线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指导”青年群体办公的隐性力量,在重构工作场景的同时,贯穿于整个工作实践的始终。此外,各种APP的

常态化使用将青年的工作惯习束缚在特定媒介的功能模式之中,长此以往会形成一种媒介依赖的行为偏向,使青年对媒介的信任感加强,从而按特定的媒介惯习参与工作实践。

另一方面,工作惯习的改变会触发青年群体思维方式的变革。青年的媒介体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惯习,它是青年与新媒介技术工具之间的关联性原则,并影响青年的媒介实践。^[20]也就是说,青年表现出的实践惯习中融合着相应的媒介逻辑。工作实践中惯习的形成是制度、规则、权力关系等一系列行为表达的集合体。在媒介逻辑的作用下,青年群体的一切行动都会被赋予媒介化的意涵,思维模式也在其涉及范围之内。当代青年在工作中进行交往活动时会有意识地选择社交媒介,传输工作资料时会首选电子文档的形式,团队协作前会先建立一个工作群等,这些由媒介所表征的行为习惯勾勒出思维转变的基本形态。由于媒介之于工作思维的巨大支撑力,青年也会竭力维护其工作思维的稳定状态,避免突发状况对工作惯习的破坏。青年在处理重要工作信息时会做出备份或上传至云端的习惯性行为,为维持手机、平板、电脑等工作设备的正常运行会预先存储备用电源。在这个过程中,看似是青年群体主动性的使用行为,实则暗含着媒介化驱使的逻辑,不仅塑造出青年媒介化的工作惯习,还促使其为应对突发状况做出预备的规避措施。由此可见,媒介对青年实践的深刻影响推动着青年工作实践媒介化转向的同时,又以惯习实践的依赖性促使青年极力维护媒介化工作惯习建立的稳定状态。

四、实践场景:青年工作空间的媒介化建构

媒介化的过程映射的是媒介与社会文化融合关系的巨大量变积累,并正在演化为一种日益重要的社会环境。^[21]媒介技术在与青年工作场景融合的过程中,通过变革青年工作的行动逻辑建构了一个习焉不察的媒介实践环境,即工作空间的媒介化建构。

(一) 媒介环境的技术再造

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认为,在传播学里技术与媒介是一对“近义词”^[22]。在青年工作实践的过程中,媒介技术是一个复杂的意义集合体。它不仅是青年工作思想、交往、关系、知识经验等积累的动态的、物质的表达形式,更是一种糅合着人的能动性、环境的可变性、秩序的规定性等工作经验与实践的动态呈现过程。青年工作对媒介的实践过程,融合了青年的主体性与媒介的行动规则,通过提升青年的工作效能规定了媒介实践方式的合法性,从而建构起青年工作实践的媒介环境。

一方面,媒介技术从变革青年工作的实践模式上为其建构了一个媒介化的工作环境。媒介技术具有强化符号效果的作用,沟通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算法等在工作场景中的应用,很大程度提升了青年的工作效能,在青年工作场所确立了特定的工作方式与办公逻辑。例如,微信等新媒介在工作中的广泛使用提高了青年工作的沟通效率,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构建了一个媒介化的办公环境。除此之外,算法在用户分析中提升了工作的精确性,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媒介技术在社会各个行业的实践建构了一个极具智能化和科技感的工作环境。青年的工作实践紧紧依赖于媒介技术而展开,整个工作空间遵循一种媒介技术的逻辑运行。媒介作为工作实践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通过技术优势建立了特定的工作方式,从而构建了青年工作的媒介环境。电脑的广泛使用带来了工作的移动性,工作空间开始突破办公室的狭小一隅;微信、腾讯会议、钉钉等社交软件对工作场景的介入逐渐确立了其权威地位,形成了一套线上沟通的办公逻辑。相应地,媒介对青年工作实践的引导通过能动的办公效能形塑起青年媒介依赖的行为惯习,同时又通过对这一惯习的持续性维护逐渐确立了一套媒介化的实践秩序,进而使青年工作的整个实践环境更加深刻和规范。

另一方面,青年与媒介的融合使得青年媒介化的工作实践逐渐“环境化”。“我们每个人借助于零

碎的、从媒体信息流中获取的信息来建构个人神话，并把它转化成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生活资源。”^[23]在工作实践中，媒介技术不仅把青年的思想和智慧进行结构化和程序化，而且也是青年思想、智慧的呈现载体。媒介技术离不开青年的表达，青年的工作实践也在媒介技术的环境中进行。办公室随处可见的计算机设备，永远在线的社交媒介，永不停歇的电子传真、打印机等已经成为当下办公场景中习以为常的工作路径。“人在创造、运用媒介的同时，始终与媒介处于共生状态”^[24]，青年的媒介实践不得不受制于媒介逻辑的影响与约束^[25]。这些媒介物充斥在青年工作场所的各个角落，青年会按照它们的媒介程序进行操作，但这些媒介物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生产、流通与保存，更是青年主体工作沟通的模式化、策略化的思维与方法。随着工作中媒介实践现象的泛化，媒介技术逐渐从一种工作的辅助性手段转变为一种常规化的工作程序，而青年的主体实践与媒介技术的融合将这种实践模式凸显为一种常在化、自然化的环境。

（二）工作内容的空间延伸

移动互联技术对社会空间的组织通过变革、重组人的表达方式与社会关系，将媒介注入到日常生活的诸多实践场景中。在“媒介—行动者”的话语逻辑下，青年社会行为对媒介的倚重与选择会加速青年媒介化行动模式向工作空间的延伸。当青年产生某种需求时，会根据具体需求选择特定媒介进行浏览、查询、娱乐、生产、维系等，这种媒介逻辑的行为习惯常常伴随着青年的社会劳动逐渐向青年工作场景中延伸，使青年工作的空间条件变得更加松弛。

一方面，媒介技术与工作场景日渐融合，延伸出生活化的工作空间。社交媒介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其与日常生活的融合所带来的人际关系的“真实感”实现了青年网络社交由“虚拟性”向“日常性”的跨越。^[26]随着社交媒介对工作场域的深度嵌入，线上办公、视频会议、虚拟团队等形式逐渐成为新型的工作模式，工作环境从传统的物理空间转变为虚拟的网络空间，线上交流的维度被打开了，曾经驻扎于私人领域的人际交流问题被赋予更深刻的文化内涵^[27]，人际交流具有了私人活动与前台工作的双重属性。工作空间在媒介的互联下开始不断地向外延伸，家庭、地铁、咖啡馆等各种私人或公共的空间都可以成为青年办公的场景。工作场所逐渐由规定性空间转变为日常生活中多样的场景空间，出现了生活场景日益工作化、工作场景日益生活化的现象。场景的交叠消融了不同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使工作内容在不同场景中铺陈开来。

另一方面，社交媒介的广泛使用将空间的延伸变得更为灵活和深刻，工作空间的实践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和充实。在青年的日常工作中，对工作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媒介完成，而工作内容则是基于工作信息展开。工作通知的下发与接收、工作内容的传输、工作推进中的讨论，包括当下应用最多的签到、打卡等实践内容都依赖于媒介的“连接”功能来实施。尤其是社交媒介对不同场景的关联将青年工作空间的实践内容扩展到媒介主导的表达框架之中。在都市青年白领的社交媒介使用中，当微信中添加的工作关系增多时，微信“朋友圈”就具有了一种“新工作场景”的性质，使得青年从放松的“后台”转向更具表演性质的“前台”，进而使青年在微信中的行为“前台化”^[28]。微信的原生价值在于促进私人领域的人际交往。随着媒介实践的动态深入，微信从私人生活的一种日常化的、轻松休闲式的交往方式，转向工作场所中的一种严肃性叙事，其作用力不仅在于微信本身的话语模式，更在于这种话语模式对工作内容的影响，即一种新的媒介化内容空间的建构。媒介实践的表征背后是青年群体工作中表达方式与工作体制之间的关系变动，青年的工作内容日益受到媒介化的影响，出现了诸如表达方式媒介化、劳动方式媒介化、体制管理媒介化等多方面的变革与转向，进而形构出青年工作场景的媒介化表征。

五、实践关系：媒介逻辑下的工作关系重塑

在媒介化社会之中,青年与新媒介的“耦合组接”已经超越了物质层面的交汇,逐渐发展为具有强烈黏性的“关系嵌合”。^[29]这种“关系嵌合”不仅重构了青年与媒介之间的意义结构,还将新媒介对关系组织的隐匿性与深刻性延伸至青年的现实人际关系之中,以一种媒介化的表达体系予以陈述。

(一) 工作关系的媒介化表达

工作场关系结构的稳定性与规定性是维系工作秩序的基本条件,通过调谐工作中各组织部门的管理结构与各工作主体间的劳动关系来保持工作场的正常运行是工作关系的意义所向。传统的工作关系结构需要以制度层面的规定性加以维系,但社交媒体在青年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凭借强大的关系组织力,重塑了青年工作关系的表达样态。

一方面,媒介重组了青年的工作关系结构。媒介化的工作实践建构了一种工作的媒介空间。在这个空间中,青年工作关系的建立、组织与维系都或多或少地与媒介发生勾连。相应地,这种关系的呈现样态与表征形式也遵循着一种媒介化的叙事逻辑。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微信空间进行工作、学习等与“社会人”责任相关的实践行为。^[26]这也说明青年对微信等社交媒介的使用以一种自然化的形式构成了青年工作中的日常景观之一。微信在青年的工作实践场所以一种合法性的存在得到了一致的认同,通过微信下发通知或安排工作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工作形式。微信在青年工作中的集体实践建构了一种线上空间的工作实践与关系呈现模式。一般而言,工作微信群中的发言人即下达通知的人与群里的其他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层级关系,而群成员通过“收到”“好的”等词汇来呼应发言人的权威,发言人与其他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屏幕上的互动加以体现。同时,青年在沟通方式上对社交媒介的倚重也重新划定了青年间的工作关系。线上沟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在场交流在语气、形象、动作等方面散发出的身份特质,青年对交流情境的感知依赖于文字所带来的想象力。这一形式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了青年间的关系规定性,使青年间的关系定位在个体感知上更具不确定性。因此,依据特定媒介的行动逻辑所表征的工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在场性工作关系的气场威力,青年工作的关系结构在社交媒体建构的工作空间中得以重组。

另一方面,青年工作场权力关系向线上转移。媒介逻辑对青年工作关系的建构不仅表现在其发生作用的外在变革形式,也是对基于现实工作身份的权力关系再组织,即媒介空间的工作关系表达与现实的权力关系一样,都是以工作主体的身份特征为基础得以建构的。青年在新媒体时代下的工作面对着“系统性压力”,青年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组织的物理边界被消融,虚拟组织成为新的组织模式^[30],青年工作的权力关系也迎来了虚拟组织空间的符号性表达。腾讯会议的实践程序通过“主持人”与“成员”间操作行为的不同来凸显工作中的身份特征,“主持人”不仅决定着会议的起止时间、主题内容,还控制着会议的话语进程与发言机制,“成员”需要通过“举手”等待“主持人”审核才能进行话语表达。传统“办公室秩序”下的权力关系往往倾向于制度层面的规定性,这是一种长期存在于工作场所的集体共识,工作主体间的身份定位清晰明确,上下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工作职位间的差别得以彰显。而媒介空间的权力关系则倾向于交流情境的主导性,这种交流情境的实践规则基于现实工作关系中的身份定位得以建立。换言之,它是一种现实权力关系的线上转移,而呈现方式从现实制度层面的集体意识和空间布局转变为媒介空间的情境建构和发言秩序。“时空分离与重组是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也是抽离化的前提条件”^[31],当下青年的工作实践几乎维持着线上与线下相融的实践形式,媒介对工作关系的组织往往与青年对媒介的实践保持着同步。大部分情况下,开辟线上实践空间

的决定一般由领导者发出,而青年在使用媒介之时一种媒介空间的交流情境已经建立,其中该交流情境的规则由领导者决定和主导。例如,在线上会议的工作实践中,采用何种媒介形式、何时上线、是何内容、如何推进、何时结束等一系列媒介空间的实践内容都由领导者决定。尽管媒介化沟通存在着非同步性特征,但媒介空间中的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之间的紧密相关性使这种实践关系仍然保持着特定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二) 权力关系的日渐隐秘

媒介化交流的跨空间性将交流主体间的身份属性予以媒介化传达,工作中依托身份信息而形成的权力关系也相应地勾连了媒介空间的关系形态。尤其是媒介技术作为工作实践的内容要素,在青年的工作交往中深刻改变了权力关系的表征形式。传统办公空间的严肃性在媒介的跨空间特性下难以维系,现实制度层面的权力关系在屏幕式的工作交流中被遮蔽。由此,青年对媒介的实践因权力关系的隐秘变得更为积极活跃。

一方面,“办公室秩序”的严肃性面临被削弱的风险。在传统的劳动体制中,“办公室”是一种集地位、形象、职业属性等意义内涵为一体的概念,随着现代媒介技术对青年劳动形态的变革,“办公室”作为青年工作的稳定性场所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特定的关系结构。在“办公室秩序”之下,桌椅摆放、空间布局、物体陈设等空间设置都反映出某种工作关系与权力关系。一般而言,工作中的领导者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办公空间或区别于其他职员的办公地点,且这个独立空间大多处于公司内地理位置较为舒适的区域,级别越高的领导者其办公室的位置就越佳。但在媒介大举入侵之后,这种权力关系的呈现方式被逐渐削弱,尤其是视频会议在工作中的应用,大大削弱了“办公室秩序”等级的严肃性。例如,在物理空间中进行的会议,每个人的位置会按照工作中的隶属结构排列,最高领导者往往会处于会议桌的中心位置,但在视频会议中,这种物理空间的位置陈列所带来的压迫感与等级性会一定程度地减弱。

另一方面,屏幕式交流弱化了制度层面的权力关系。相较于传统“办公室秩序”所形成的工作关系,以及面对面沟通而建立的合作关系,线上办公、视频会议、虚拟团队等工作形式所建立的跨屏幕式的联系越来越成为当下青年群体与他人建立工作关系的主要方式。在这种线上的工作沟通中,屏幕式的交流将青年的工作关系裹上了一层媒介化的外衣,其中层级分明的权力关系在这种媒介化的交流中变得更为隐秘。青年群体在工作中越来越脱离时空在场的劳动秩序,媒介技术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工作体系。当制度层面的权力关系被遮蔽时,青年群体与媒介的互动更加积极,他们不仅在工作中积极地使用媒介,而且会按照媒介的交往逻辑调整自身的行动以适应媒介化社会的工作关系。青年在工作中无论是与同级之间交流,还是上下级之间沟通,都更加依赖于社交媒介的离场化方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相较于“办公室秩序”的等级感和压迫感,线上办公的自由度更高,对青年的工作空间没有太大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线上工作使得青年心理的紧张感与压迫感降低,实在的权力关系在面对面的关系形式中更能展现其规制力,而这种线上的工作形式则使这种工作关系更加隐秘,从而使青年的工作心理得以调谐。同时,权力关系的隐秘并不能消解实质性的工作身份,只是将权力关系的表达转移到线上,通过特定媒介的实践规则以一种媒介空间的表达方式得以凸显。

六、制度嵌入:媒介化工作实践的权力规制

媒介化的过程是一个媒介与社会互动的过程,社会各场域不仅受到媒介逻辑的影响,而且也通过调整自身来利用媒介获取更多的资源。库尔德利将媒介视为一种“元资本”,它能在社会各场域中转化

为不同的资本形式。^[13] 由于媒介资本所具有的资源转化与资本生成的性质, 媒介就成了社会各场域争夺的对象, 谁能更多地拥有媒介、更好地利用媒介, 谁就能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在青年工作场域, 媒介化的工作实践同样存在着复杂的资本关系。

(一) 工作场的资本挟制

工作在追求资本营收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资本运行逻辑的挟制。其中媒介技术作为挟制力量之一, 不仅能够创造出新资本创收的社会行业, 还为青年个体提供了一种追逐资本的机会和平台, 由此出现了诸如“斜杠青年”这样新的职业身份。“斜杠青年”的出现是由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的出现, 与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结合产生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为青年群体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职位空缺。^[32] 手机与互联网实现了信息的跨地域传播, 从而产生了电子贸易、物流、移动支付等社会行业; 随着媒介技术的深入发展, 音视频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催生了各种生活服务、娱乐休闲、社交类的软件出现。在媒介化的社会浸透性和媒介资本的资源优势下, 媒介不仅开创了诸如移动通讯、影视、电商、游戏等工作领域, 同时也成为青年群体在工作中谋取个人利益的一种手段。在互联网与计算机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 工作的劳动机制逐渐脱离体力劳动的秩序, 转向数字劳动与管理的资本创收形式。在这样的工作实践中, 精通计算机技术的青年职员在工作中会拥有更多话语表达的机会, 他们会为其他人提供这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进而也会为自身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这一方面是媒介技术的驱使, 使得更为轻便快捷的媒介物为普通大众所拥有; 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媒介的争夺和对抗使其资本转化的优势为社会大众所认同。媒介不再成为少数人资本竞逐游戏的目标, 它已下沉至社会大众。青年个体也加入到资本争夺的战场, 并有机会通过媒介获取流量和个人利益, 而他们中的胜出者将脱离个体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到相应的群体之中, 成为群体(场域)利益竞争的行动因子。例如, 当下的新媒体博主、Vlogger、主播等各种媒介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出现, 即是社会个体努力参与资本争夺的表征形式。而当他们通过媒介获得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时候, 会逐渐被特定场域所吸纳, 成为融合特定群体属性的媒介行动者。由此可见, 媒介对场域或青年个体的影响并不是让场域或青年个体单方面被动改变规则来适应媒介逻辑, 而是为着特定目的对媒介的策略性运用。其中对于媒介而言, 它的“元资本”性质也为自身在社会实践中的普及与渗透提供了动力。

在青年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权力关系与资本形式, 一是存在于规章制度层面的领导者与员工之间直接的上下级关系, 它所形成的是集体劳动带来的资本创收, 这种资本创收的形式多存在于实体经济行业; 二是媒介所建构的隐形的话语权, 它所形成的是技术带来的资本收益, 这种资本形式多存在于虚拟经济行业。两种形式的权力关系与资本形式并不是彼此分明的, 只是在不同行业中的凸显程度有所不同。但无论是哪一种资本创收的形式, 都搭建在工作话语的体系之中, 受到资本运转形式的挟制。无论是对个体、集团、企业, 还是对社会来说, 资本都是工作最原始、最长久、最根本的劳动目的。因此, 工作场对资本的追逐将青年转化为一个个的运行因子, 通过串联个体间共同的利益诉求与劳动价值观, 在满足青年资源分配的同时实现资本创收的最大化。

(二) 新工作秩序的隐性伤害

正如电脑和打印机的广泛使用重新定义了劳动关系一样,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介的合法化也趋向于威胁传统会议室的权威, 并逐步建立起媒介空间的权力关系形式。领导者的地位在媒介空间中通过信息(任务)发布者的身份出现, 并以话语拥护者的身份体现其主导地位。媒介空间内的工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制度层面的权力关系, 更多地以一种隐形的媒介形式呈现, 但是这种媒介化工作实践的权力关系也会带来一种隐性伤害, 即数字鸿沟在工作中的日渐加深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一方

面,工作形式的转变使得工作场所对青年的要求和准入标准日益提高,青年除了要具备良好的专业水平之外,还要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掌握相关的数字技术。但社会整体的资源流向并不均衡,技能习得的成本与专业研习的成本会为青年带来更大的压力,最终造成工作中资源优渥者与资源匮乏者之间地位与资本的差距越来越大,并带来更为广泛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媒介化的工作实践之下,青年的工作产出不断提高,而工作时间却变相延长。以网络为中心的技术使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或是手头上有任何业务的情况下都能见缝插针地工作。^[33]媒介打破了工作场景和私人场景的界限,使得工作内容延伸至青年的私人生活,导致弹性的工作时间向个人生活时间的溢出^[34],劳动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减轻青年的劳动时长,反而造成了劳动时间对私人时间的侵占。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劳动的效能标准逐渐提高,资本创收的周期日益缩短,导致社会矛盾的加深,以及工作时间变相延长和工作场景的延伸。其根源不仅在于媒介实践的社会化表征,更在于媒介作为一种“元资本”在与社会政治及各种资本形式的融合转化中生成了特定利益分配的社会文化。青年的工作实践在这种社会文化逻辑之下转向了媒介化的实践路径,并由此带来了工作制度、规则、资本与权力的一系列变革。

七、结 语

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群体的劳动性工作内容日渐被媒介逻辑所卷入与裹挟,从而建构了工作实践的媒介化转向。在青年工作实践的媒介化过程中,主体、场景及关系等三重维度在技术的变革话语中,日渐呈现出一种深度媒介化的表征结构。在这种媒介化的意义表征中,具有“元资本”属性的媒介逻辑不断地创新权力关系的表达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工作场域的“时间规训体系”,似乎赋予了青年更加“自由”的劳动时间。殊不知,青年媒介化工作的这种“弹性自由”反而在“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卷入中,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由此,青年群体的媒介化工作实践在丰富日常情境的表征结构的同时,投射了青年的社会实践与媒介逻辑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形塑的文化状态及其社会秩序成为我们思考青年、媒介与文化的关键着力点。与此同时,媒介化工作实践的背后所隐匿的资源不均以及时间失控问题,值得我们予以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 [1] [美]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M]. 夏铸九, 王志弘, 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20.
- [2] 肖恩·塞耶斯, 周嘉昕. 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围绕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考察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7 (1): 33-41.
- [3] 黄庆平, 张振华, 吴珂威等. 数字经济时代的职业演进与青年职业发展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9): 114-119.
- [4] 澎湃新闻. QuestMobile2022 全面数字化发展下的消费市场洞察 [EB/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46200.
- [5] 左雅靓, 窦泽南, 张建英, 乔志宏. 青年技能型人才的前瞻性人格、职业认同与工作适应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5): 60-64+45.
- [6] 郑楠, 周恩毅. 高校青年教师的工作幸福感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 (10): 58-64.
- [7] 方奕, 王静, 周占杰. 城市快递行业青年员工工作及生活情境实证调查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 (4): 5-11.
- [8] 张斌. 中国字幕组、数字知识劳(工)动与另类青年文化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 (3): 5-12.
- [9] [丹] 施蒂格·夏瓦. 文化与社会媒介化 [M]. 刘君, 李鑫, 漆俊邑, 等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3.
- [10] 孙萍. 媒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传播、物质性与数字劳动 [J]. 国际新闻界, 2020 (11): 39-53.
- [11] 王琛元. 欧洲传播研究的“媒介化”转向: 概念、路径与启示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05): 5-26+126.

- [12] Bruno, L. (2007).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3] [英] 尼克·库尔德利. 媒介、社会与世界: 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 [M]. 何道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39.
- [14] Nick, C. (2008).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10 (3): 373-391.
- [15] 马超. 数字媒体时代城乡青年的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研究——来自 S 省青年群体的实证调查 [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5): 79-100.
- [1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B/OL]. <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303/c88-10757.html>.
- [17] 赵红勋. 微传播语境下青年群体的媒介行为与心理分析 [J]. 当代青年研究, 2017 (1): 70-75.
- [18] 戴宇辰. “旧相识”和“新重逢”: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 (化) 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 [J]. 国际新闻界, 2019 (4): 68-88.
- [19] 段俊吉. 打造“人设”: 媒介化时代的青年交往方式变革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 (4): 31-39.
- [20] 冯刚, 胡玉宁. “中国体验”中的青年品格: 文化反哺的媒介化转向与实践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 (12): 113-119.
- [21] 施蒂格·夏瓦, 刘君, 范伊馨. 媒介化: 社会变迁中媒介的角色 [J].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5): 59-69.
- [22] [加] 罗伯特·洛根. 理解新媒介: 延伸麦克卢汉 [M]. 何道宽,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7.
- [23] [美] 亨利·詹金斯. 融合文化: 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 [M]. 杜永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31.
- [24] 杨柏岭. 作为文化的传播: 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形上之思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08): 9-15.
- [25] 周孟杰, 徐生权, 吴玮. 媒介逻辑何以嵌入行动——返乡青年短视频研究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2 (01): 66-73.
- [26] 彭正银, 汪爽. 青年网民移动社交网络持续使用意愿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网络外部性视角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 (12): 67-72+79.
- [27] 姚文苑. “Emoji 社交”: 视觉语言媒介的入场与数字交流方式重构——青年群体在微信中的 emoji 实践解析 [J].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21 (3): 81-95.
- [28] 郭瑾, 蒲清平. 重构与改造: 都市青年白领的社交媒介使用与社会交往 [J]. 青年研究, 2016 (1): 1-4.
- [29] 赵红勋. 新媒体依赖视域下青年群体的“信仰风险”论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2020 (1): 13-20.
- [30] 佟亚洲. 新媒体时代青年工作面对的新挑战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0 (04): 103-108.
- [31] 郭恩强. 在“中介化”与“媒介化”之间: 社会思想史视阈下的交往方式变革 [J]. 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8 (8): 67-72.
- [32] 敖成兵. 斜杠青年: 一种“互联网+”时代的职业身份解码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 (12): 80-84.
- [33] [美] 帕特里夏·华莱士. 工作过场所中的互联网——新技术如何改变工作 [M]. 王思睿, 印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75.
- [34] 张铮, 陈雪薇, 邓妍方. 从浸入到侵入, 从待命到疲倦: 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 [J]. 国际新闻界, 2021 (3): 160-176.

[责任编辑: 谢薇娜]